

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齐路良, 谢科范^①

(长沙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基于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研究高校廉政风险的影响要素及防范机理,揭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统计规律,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廉政风险; 高校; 因子分析; 防范机理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6-0029-06

2015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手册(修订稿)》,各大高校普遍采取了诸如廉政风险专题网、廉政风险工作网、廉政风险防控信息公示平台等多种形式的廉政风险防控网。当前,高校已普遍重视廉政风险的防控工作,重点关注重大项目、重大决策、重大人事任免、大额资金使用等“三重一大”事务在网上的公开与公示。在接受全体教职员工及师生监督的同时,并建立了积极有效的事前追溯、事中监督与事后跟踪机制来杜绝“三重一大”可能引发的高校廉政风险。高校基建、招生、人事等主要重点工作的流程、信息、节点、成果等的公开公示与跟踪,使得各类风险点与风险源始终处于显性、开放、可控的状态。与“三重一大”相对应的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特殊职责等在权力清单和公开公示以及跟踪机制的约束下,将得到合理、规范、有效的履行,寻租行为将得到有效控制。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从高校廉政风险的诱因及结果、高校廉政风险防范的体制机制等宏观、定性的视角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高校廉政风险防范机制的形成、制订及落实的统计规律如何,哪些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高校廉政风险防范机制的实施等问题,均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问卷调查与因子分析的方法揭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的统计规律,为高校廉洁风险防控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一 基本理论与变量设计

高校廉政监督机制是广大师生员工正确地运用

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是提高高校工作效能及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1]。通过构建和完善高校廉政风险监督机制,保障高校民主监督渠道的畅通,高校能够建立起配置健全、高效、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实现高校权力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及平衡,从而有效地预防廉政风险。换句话说,高校廉政风险监督机制有利于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以及完善,并通过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来间接地预防廉政风险。当前,我国高校相关部门的执行权、监督权、决策权仍然存在着很多的混淆不清的地方,为腐败提供了生存的土壤^[2],而内外监督的存在既有利于逐步划清权力界限,同时也会对权力拥有者形成一定的外部约束力。从风险警示的角度出发,内外监督机制的存在能够给权力拥有者一定的警示和威慑。权力拥有者在面对诱惑时会对腐败的成本、腐败的收益以及腐败的风险进行衡量,当内外监督机制较为完善时意味着腐败的风险高、腐败的成本大,从理性和长远的角度出发,权力拥有者很大可能会选择放弃腐败行为,由此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行为。从发现腐败的角度出发,内外监督机制更有利于发现腐败行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并通过追究腐败责任来遏制腐败的溢出效应。相关学者直接指出监督机制对预防腐败的重要作用,例如敖丽认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以及监督,在关键环节和权力运行的重点岗位,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重要作用,预防行为失范以及权力失控^[3]。

概括来说,监督机制的构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收稿日期] 2015-10-23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学术腐败问题研究”资助(编号:12CGB001)

[作者简介] 齐路良(1970-),男,湖南永州人,长沙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内容,监督主体、监督客体以及监督途径。从监督的客体角度出发,无法对高校的所有部门和所有环节都进行同等程度的监督,换句话说,监督必然有其重点和关键环节,而这一观点已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可。王敏和俞亚芹(2013)认为高校应该持续创新方法,强化对廉政风险点的监管,对高风险的岗位部门,应实行标注化的办事程序并予以公开,结合组织内部监督和组织外部监督,构建动态化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4]。杨金保(2006)亦指出,针对容易产生权力滥用的环节和岗位,应不断地拓宽监督渠道,采用多种形式的监督方法,努力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及条件^[5]。内外监督机制的存在一方面能够突出重点监督的重要性,引起高校以及学者对高风险环节的关注。另外,内外监督有利于发现重点环节和岗位的风险行为,能够将腐败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从而使得重点环节防控取得良好的效果,促进廉政风险重点预防的良性循环。

廉政风险教育是高校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防治高校腐败的根本性措施^[6]。廉政风险教育的普及能够促进廉政文化的形成,当廉政文化扎根于人们的意识,并转为人们的行为方式时,便会形成无处不在的自我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7]。廉政风险理念教育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构建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而且,还能促进廉政文化以及廉政制度内化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8-9]。另外,通过将广大的师生员工纳入到廉政风险教育活动中来,廉政风险教育能够促进相互勉励、相互督促的反腐倡廉的群众监督机制的形成。从此三方面来说,廉政风险教育能够有效的预防廉政风险。

当前,高校腐败现象经常见诸于报端,深探原因,不难发现,腐败教职工以及党员干部往往重视才能、轻视道德,重视业务、轻视政治,忽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虽然说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从廉政风险预防角度讲,德治似乎更为重要^[10],因而必须加强廉政风险教育,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将廉政风险意识以及廉政价值观深层次地内化,帮助师生员工形成正确的利益观、权利观以及地位观,从而引导师生员工修德洁身,构筑抵制诱惑的坚固防卫线。廉政风险教育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廉政文化的作用持久而广泛,影响着员工师生的内心世界以及情感、思想,通过它们的作用,师生员工能够在人格上逐步升华和完善,形成积极的人格以及崇尚廉洁的思想观念^[11],从思想观念上对腐败形成坚强的抵抗力。学者倪敏玲(2010)更是突出了廉政风险教育的重要作用,

指出廉政风险教育要能够帮助形成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崇高的思想道德情操,能够帮助师生员工抵御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12]。

廉政风险教育除了能够帮助师生员工在思想上形成坚定的抵抗力外,还能通过构建廉政文化来对师生员工的行为方式进行约束规范、调节整合以及引导激励,廉政风险教育能够调节师生员工的心绪、目标、方向等等,在舆论力量和制度力量的共同支撑下,使他们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目标^[13],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腐败行为。廉政风险教育预防腐败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无形监督的形成。通过廉政风险教育,广大师生员工会提高自身的廉洁意识、责任意识,在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的同时,还会对腐败行为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从而推进反腐倡廉的群众约束机制的形成^[8]。

高校廉政风险点集中于干部选任、招标采购、基本建设、招生录取以及财务和审计等环节^[14]。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应以这些易发生腐败的重点环节为切入点,以制约和规范权力为主轴,将关键性岗位和环节(人、财、物权力集中环节)纳入重点监控范围,有步骤、按层次、有规划地打击腐败行为,从而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15]。廉政风险教育不仅能促进廉政价值观的构建、还能促进廉政法规体系、廉政组织体系与人员队伍、廉政活动体系以及廉政活动评价机制的构建^[16]。廉政法规体系能够为廉政重点防控提供法律制度保障,而廉政组织体系能够为重点防控提供组织体系保障,人员队伍能够为重点防控提供人才保证,从而推进廉政风险重点防控工作的开展。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廉政风险防控亦有着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想更好地预防廉政风险,必须要抓主要矛盾,即要对关键性环节和岗位进行重点预防。高校运转的整个流程中都存在着廉政风险,但相对而言,某些岗位以及某些环节的廉政风险要高于其他岗位和环节,而预防腐败的资源是有限的,因而需要对这些易发生腐败的岗位和环节进行重点防控。廉政风险重点预防是廉政风险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防控有利于实现防腐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提高风险预防的整体效应,从本质上来说,重点防控是廉政风险预防的重要方法和重要手段。

高校廉政风险概括说来集中于人员招聘、科研管理、采购、招生、后勤以及基本建设等等重要环节和重要部门,对这些关键性的岗位以及环节进行重点防控,并对一些倾向性和苗头性的问题进行预警和提示,可以大大提高廉政风险预防的工作效率以

及效益^[17]。同时,对这些关键环节进行重点防控,还能对高校其他环节的防控产生连带效应,即遏制廉政风险的溢出效应。廉政风险本身具有溢出效应^[18],当人们感觉到其所处的环境中的腐败水平较高时,会降低对腐败的抵抗力,从而进一步提高腐败水平^[19],形成恶性循环,反之,当人们意识到反腐力度较高时,则会增强对腐败的抵抗能力,形成反腐的良性循环。重点防控通过集中力量能够有力地加大反腐力度,给高校其他非重要环节和部门一定的威慑,从而从整体上预防并遏制腐败行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对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影响因素及测量变量设计如下:

表 1 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影响因素及测度量表

序号	测量变量
V1	带头模范遵守《廉政守则》等各项规定、制度,自觉接受监督,切实做到令行禁止、洁身自好、绝不发生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V2	高校廉政风险防控需要重点抓好重点部门、特殊领域、关键岗位、重要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V3	有效防范高校廉政风险需有效梳理可能违反廉政规定的可能行为并排序和划分等级
V4	加大内审力度,规范财务行为,为防范风险提供监督保障
V5	各级领导及一线教学科研人员以积极的心态未雨绸缪、加强自律、共同参与,没有发生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行为
V6	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的人,针对他们的防控措施就要更多更严
V7	您非常了解自己所在岗位在人财物方面可能出现违反廉政规定的地方
V8	廉政风险防控相关制度对您所在岗位各项工作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V9	您所在岗位想要真正杜绝廉政风险需要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督
V10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在防范高校行政和科研人员廉政风险中扮演重要角色
V11	对于潜在风险点长期地、持之以恒地、动态地事先洞察先机的工作,发现重大问题后坚持集体研究和协商,有效避免个人决策失误
V12	廉政风险防控的相关制度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能够有效约束您所在部门及岗位的行为规范,避免了利用职权,在企业经济活动和人员使用上,谋取私权,给企业造成损失
V13	您非常了解自己所在岗位的工作违反廉政规定将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
V14	您很清楚如何对所在岗位可能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二 样本选择

以省内 6 所高校工作人员为调查对象(包括纪委、审计处等管理部门,基建、招生、后勤等廉政风险多发易发部门,以及一线教学科研人员等不同群体),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高校内部发放问卷并与部分调查对象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沟通交流,共发

放问卷 420 份,回收问卷 410 份,回收率达到 97.6%,其中有效问卷为 396 份,有效率为 96.6%,其中面对面交流人数为 42 人次。

三 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一)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基于 SPSS20.0 统计分析软件,KMO(Kaiser – Meyer – Olkin)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结果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 – Meyer – Olkin 度量		.743
	近似卡方	1039.910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df	91
	Sig.	.000

KMO 统计量取值在 0 和 1 之间。当所有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大于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 值接近 1;当所有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接近 0 时,KMO 值接近 0。KMO 值越接近于 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作因子分析。KMO 值越接近于 0,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弱,原有变量越不合作因子分析。一般认为 KMO 大于 0.7 时,就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次分析中的 KMO 度量为 0.743(大于 0.7),适合度比较高,表示此观测值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的原假设为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卡方值为 1039.910,Sig 值为 0.000,小于显著水平 0.05,表示本次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3 变量共同度表

公因子方差		
	初始	提取
V1	1.000	.731
V2	1.000	.741
V3	1.000	.618
V4	1.000	.779
V5	1.000	.604
V6	1.000	.655
V7	1.000	.415
V8	1.000	.867
V9	1.000	.799
V10	1.000	.727
V11	1.000	.778
V12	1.000	.804
V13	1.000	.697
V14	1.000	.536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二)变量共同度

表 3 中给出了每个变量共同度的结果,变量共同度表示各变量中所含原始信息能被提取的公因子

所解释的程度。第 2 列表示每个变量可以被所有因素所能解释的方差,第 3 列表示变量的共同度。从表中可以看到,因子分析的变量共同度都比较高,表明变量中的大部分信息能够被因子所提取,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有效的。

(三)解释的总方差

可采用主成分法选取特征值大于 1 的特征根来确定主因个数。表 4 中给出了因子贡献率的结果,表中第 1 列是因子编号,以后三列组成一组,每组中数据项的含义依次是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第一组数据项描述了因子初始值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第 1 个因子的特征值是

4. 089,可解释原有 14 个变量总方差的 29. 269%,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29. 269%,其余数据含义类似。第二组数据项描述了因子解的情况,可看到,前 4 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 1,可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 69. 641%。总体上,前 4 个因子反映了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第三组数据描述了经过旋转后最终因子解的情况。可见,因子旋转后累计方差比没有改变,但重新分配了各个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方差,改变了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表中显示前 4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 1,累计贡献率为 69. 641%,即约 69. 641%的总方差可以由 4 个潜在因子解释。

表 4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解释的总方差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4. 098	29. 269	29. 269	4. 098	29. 269	29. 269	3. 254	23. 241	23. 241
2	2. 672	19. 088	48. 357	2. 672	19. 088	48. 357	2. 411	17. 224	40. 465
3	1. 808	12. 911	61. 268	1. 808	12. 911	61. 268	2. 126	15. 183	55. 648
4	1. 172	8. 372	69. 641	1. 172	8. 372	69. 641	1. 959	13. 993	69. 641
5	. 854	6. 103	75. 744						
6	. 655	4. 680	80. 424						
7	. 531	3. 791	84. 214						
8	. 484	3. 461	87. 675						
9	. 464	3. 316	90. 991						
10	. 339	2. 423	93. 414						
11	. 290	2. 068	95. 482						
12	. 266	1. 901	97. 383						
13	. 192	1. 371	98. 754						
14	. 174	1. 246	100. 000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四)碎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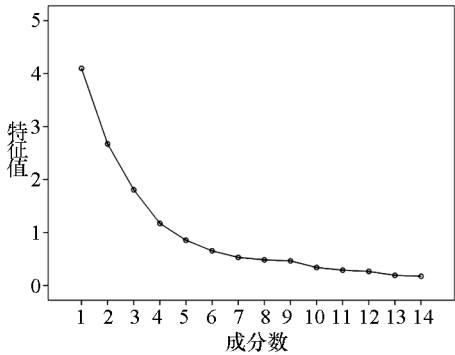


图 1 碎石图

图 1 给出了特征值的碎石图,通常该图显示大因子的陡峭斜率和剩余因子平缓的尾部,之间有明显的中断。一般选取主因子在非常陡峭的斜率上,而处在平缓斜率上的因子对变异的解释非常小。从该表可以看出前 4 个因子特征值都大于 1,且都处在非常陡峭的斜率上,而从第 5 个因子开始斜率变平缓,因此可以选择前 4 个因子作为主因子。

(五)成份矩阵与旋转成份矩阵

表 5 中给出了未旋转的因子载荷,从表中可以得到利用主成分方法提取的 4 个主因子的载荷值。为方便解释因子的含义,需要进行因子旋转。

表 5 成份矩阵

成份矩阵 a				
	成份 1	成份 2	成份 3	成份 4
V1	.746	-.309	-.228	-.162
V2	.733	-.340	-.295	-.018
V3	.717	-.086	-.222	-.217
V4	.683	-.408	-.338	.176
V5	.579	-.029	.517	.024
V6	.578	-.362	-.343	.269
V7	.488	.222	.123	-.335
V8	.248	.814	-.300	.231
V9	.262	.792	-.245	.207
V10	.306	.714	-.214	.278
V11	.489	.022	.645	.350
V12	.530	-.061	.613	.379
V13	.464	.373	.337	-.479
V14	.395	.404	.060	-.462

提取方法:主成份。a. 已提取了 4 个成份。

表 6 旋转成份矩阵

旋转成份矩阵 a				
	成份 1	成份 2	成份 3	成份 4
V4	.870	.002	.134	-.062
V2	.842	-.023	.099	.147
V1	.794	-.073	.090	.294
V6	.780	.055	.125	-.167
V3	.667	.079	.050	.405
V8	-.009	.919	-.042	.147
V9	-.017	.876	-.003	.176
V10	.040	.840	.076	.11
V12	.151	.017	.882	.051
V11	.066	.054	.873	.093
V5	.194	-.055	.667	.344
V13	-.018	.109	.236	.793
V14	.054	.218	-.001	.697
V7	.182	.119	.151	.587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法。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 旋转在 5 次迭代后收敛。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到 14 个指标在 4 个因子上的新的因子载荷,结果显示,V4、V2、V1、V6、V3 这 5 个变量在第 1 个因子(F1)上有较高的载荷,F1 主要解释这 5 个变量,可以把 F1 命名为廉政风险的重点防控(ZDFK);V8、V9、V10 这 3 个变量在第 2 个因子(F2)上有较高的载荷,F2 主要解释这 3 个变量,可以把 F2 命名为廉政风险的内外监督(NWJD);V12、V11、V5 这 3 个变量在第 3 个因子(F3)上有较高的载荷,F3 主要解释这 3 个变量,可以把 F3 命名为廉政风险的事先预防(SXYF);V13、V14、V7 这 3 个变量在第 4 个因子(F4)上有较高的载荷,F4 主要解释这 3 个变量,可以把 F4 命名为廉政风险教育(FXJY)。

(六)成份得分系数

成份得分系数矩阵中的各变量已经不是原始变量,而是标准化变量。根据成份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写出各公因子的表达式:

$$F1 = 0.239V1 + 0.269V2 + 0.192V3 + 0.295V4 - 0.028V5 + 0.275V6 - 0.002V7 + 0.007V8 - 0.003V9 + 0.014V10 - 0.067V11 - 0.035V12 - 0.098V13 - 0.040V14$$
$$F2 = - 0.067V1 - 0.16V2 - 0.020V3 + 0.034V4 - 0.064V5 + 0.075V6 - 0.041V7 + 0.398V8 + 0.374V9 + 0.371V10 + 0.034V11 + 0.027V12 - 0.084V13 - 0.022V14$$
$$F3 = - 0.076V1 - 0.050V2 - 0.101V3 + 0.002V4 + 0.293V5 + 0.025V6 - 0.028V7 - 0.021V8 - 0.005V9 + 0.042V10 + 0.464V11 + 0.467V12 + 0.004V13 - 0.116V14$$
$$F4 = 0.119V1 + 0.008V2 + 0.184V3 - 0.143V4 + 0.108V5 - 0.212V6 + 0.324V7 - 0.059V8 - 0.038V9 - 0.087V10 - 0.099V11 - 0.130V12 + 0.466V13 + 0.416V14$$

表 7 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旋转成份矩阵 a				
	成份 1	成份 2	成份 3	成份 4
V1	.239	-.067	-.076	.119
V2	.269	-.016	-.050	.008
V3	.192	-.020	-.101	.184
V4	.295	.034	.002	-.143
V5	-.028	-.064	.293	.108
V6	.275	.075	.025	-.212
V7	-.002	-.041	-.028	.324
V8	.007	.398	-.021	-.059
V9	-.003	.374	-.005	-.038
V10	.014	.371	.042	-.087
V11	-.067	.034	.464	-.099
V12	-.035	.027	.467	-.130
V13	-.098	-.084	.004	.466
V14	-.040	-.022	-.116	.416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法。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四 结论

基于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文以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为基础,通过调查问卷获得指标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处理,提取了影响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影响因素的 4 个主因子:廉政风险的重点防控(ZDFK)、廉政风险的内外监督(NWJD)、廉政风险的事先预防(SXYF)、廉政风险教育(FXJY),并且需要突出加强廉政风险的重点防控(ZDFK)和

廉政风险的内外监督(NWJD)建设,因为这两个主因子方差贡献率相对更大。由此,高校廉政风险的防范应当围绕重点防控、内外监督、事先预防和风险教育而展开,以这四个方面为支柱构建防控体系;要着力强化重点防控和内外监督,抓住重点领域、重点对象、重点事项、重点环节落实防范措施,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机结合,形成合力。

[参考文献]

- [1] 赵运林. 高校廉政监督机制建设的哲学思考[J]. 湖湘论坛, 2006, 109(4): 87-88.
- [2] 罗 瑛. 中国教育腐败问题的制度缺陷与对策研究[D].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09.
- [3] 敖 丽.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研究[J]. 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4): 1-3.
- [4] 王 敏, 俞亚芹. 关于建立民办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思考[J]. 学周刊, 2013(5): 39.
- [5] 杨金保. 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5(3): 118-121.
- [6] 赵文正, 范晓清, 唐贞清, 王月明, 韩传国. 关于构建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探讨[J]. 孝感学院学报, 2006, 26(4): 42-45.
- [7] 于新亮. 浅论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C]. 北京教育纪检监察工作研究会 2007 年年会论文集, 2007.
- [8] 薛凯麟. 关于有效推进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J].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 2011, 105(3): 49-52.
- [9] 曲 雁. 基于“内化”视角的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路径探讨[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3(3): 94-96.
- [10] 方守志, 汪 伟, 史 萍. 高校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研究[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 9(4): 72-74.
- [11] 张丽艳, 徐 铭. 浅议高校廉政文化的载体建设[J].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09(8): 54-55.
- [12] 倪敏玲. 大学精神视角中的高校廉政建设[J]. 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3(2): 15-17.
- [13] 孙丽霞. 论如何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J]. 商业经济, 2010, 347(4): 117-119.
- [14] 张金刚, 孙 郁. 加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思考与对策[J]. 中国轻工教育, 2012(5): 3-6.
- [15] 李燕凌, 吴松江, 胡扬名. 我国近年来反腐败问题研究综述[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11): 115-119.
- [16] 孙瑰杰.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论析[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 [17] 何希耕.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研究[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3, 26(7): 60-63.
- [18] Osipian Ararat L. Political Graft and Education Corruption in Ukraine: Compliance, Collusion, and Control [J]. Demokratizatsiya, 2008, 16(4): 323-344.
- [19] Čábelková I, Hanousek J. Th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willingness to bribe in Ukraine [J]. Applied Economics, 2004, 36(4): 383-397.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rruption Ris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QI Lu-liang, XIE Ke-fan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angSha 41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anti-corruption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rruption ris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hich will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anti-corruption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corruption ris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tor analysis; mechanism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